

六朝文學叢書

六朝作家年譜 輯要 上冊

● 刘跃进
范子烨 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六朝文學叢書

六朝作家年譜輯要

上冊

● 刘跃进

范子焯

編

LT0000151267T



K825.6
792.1



六朝作家年谱辑要 (上册)

刘跃进 范子烨 编

责任编辑: 孙延凤

封面设计: 陈冬妮

责任校对: 许隽超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31.75·字数 745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200

ISBN 7-5316-3463-5/I·114 定价(上下册): 45.70 元

《六朝文学丛书》总序

下 序 重

六朝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着无限创造力的富于文采的大变革时代。旧的风尚习俗，旧的文化思想，无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求变求新潮流的推动之下，六朝文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是其来有自的。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名文中，称汉魏之际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文的自觉，来自人的自觉。曹氏主政，一改以前统治者“率先经术”的传统，转向重视文才。《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文学冲破经学的桎梏而活跃起来，日益显示其自身的美学价值。这种自觉精神，为东晋南朝文人所继承和发扬。据《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 15 年（438）令开四馆教学，以文学与儒学（经学）、玄学、史学并列；范晔著《后汉书》，首设《文苑传》；萧子显著《南齐书》，也设《文学传》，皆标志着文学地位的空前提高——纯文学的真正独立。于是，六朝文学便洪波迭起，蔚为大国，积淀为彼时文化史的一个

最丰厚的层面。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文学方面的累累硕果与绚丽奇葩，正是这种成就最显著的标志。

六朝时期，诗歌的题材大大开拓，陶潜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都是文学史上创造性的贡献。左思之于咏史诗，潘岳之于悼亡诗，郭璞之于游仙诗，鲍照之于边塞诗，都有开基拓疆之功。诗歌的风格多样化，著名作家各有所擅，民歌情深而净洁，语短而采多，使人屡读不厌。就其创作之轨迹而言，六朝诗歌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赋则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骈文最具“美文学”之意蕴，文体屡变，其中永明体渐开四六的门径，徐庾体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骈文尽管盛行，散文创作仍有重要地位。

志人、志怪小说并驾齐驱，各呈异采，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干宝的《搜神记》和刘敬叔的《异苑》乃其中之佼佼者。

在文集编纂方面，综合的文章总集和各体的文章总集大量问世，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在文学批评方面，继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之后，不仅出现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高水平的论文，更产生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两部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

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六朝文学的总体倾向与时代特征：

（一）文学语言求“丽”。六朝文学作品多具华美的特征，文人竞相“踵事增华”（《文选序》），一争雄长。其时之诗文，句法讲求排偶，语词注重雕琢，声韵有了限制，典故随处而出。作家们往往通过提炼语言，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达到“入

耳”“入目”的感染效果，提高文学的美学价值。曹丕讲“欲丽”，陆机讲“绮靡”，萧统讲“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既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创作实践的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在“错彩镂金”的美感之外，还有“初发芙蓉”的美的理想。六朝文人成功地发掘了汉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潜力，为后世指示了可以深入发挥的门径。他们所描绘的种种意象，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具有魅力的自然原型。

(二) 文学创作的“缘情”主张成为主旋律。陆机强调“诗缘情”。六朝作家、理论家都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推崇“吟咏情性”（《诗品》）。文学创作关键在于情感作用。抒情是创作的动因，也是衡量作品之美的主要标准。曹植为文“雅好慷慨”，陆机反对“言寡情而鲜爱”，陆云称赞“流深情至言”之作，钟嵘倡言“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萧绎认同“流连哀思”之文，都体现了这种审美倾向。抒情小赋取代大赋，抒情文的长足发展，都与此息息相关。“缘情”说是六朝文人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朽贡献。不过当时对“缘情”理解不一，如刘勰、萧统等人认为“情”必须受“志”的规范，而萧纲兄弟则认为“情”不受“志”的任何约束。

(三) 文学发展进程中不断“新变”。“新变”主要指形式技巧上的尝试探索。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道破了六朝的时尚。从诗歌形式上看，汉魏时七言古诗尚处于萌芽状态，经鲍照等作家的积极探索，才日渐繁荣。永明时期，沈约等提倡作诗应区别四声，避免“八病”，经过齐、梁、陈三代诗人的创作实践，为近体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诗文技巧上看，六朝文人追求的是巧于对偶，谐于声调，神于字词（包括用字奇妙、词序颠倒、词性活用、容量增加等等），成绩显著，影响深远。

(四) 文体的区分日益细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不断深入。

文体的区分，自魏晋至南朝，由粗略的四科、十体，逐渐加密，最后归纳为三十余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魏晋人已有自觉的探索意识，南朝人进一步地作了思考，明确提出“文”、“笔”不同之说，或以有韵与无韵为标准，或以是否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辞采美为标准，纯文学的观念真正自立门户了。

总之，六朝文学“自觉”于美的创造，“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经过几百年的积累，获得巨大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六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当然，六朝文学也有缺陷和糟粕，这同其他时代文学亦良莠并存一样，不必惊怪。范文澜先生说得好：唐文学“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就形式说，“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所言极为中肯、深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辑了《六朝文学丛书》，发表关于六朝专书、作家、作家群体和文体四个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力求比一般文学史专一些，细一些，深入一些。第一批问世的四部专著，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代表作。兹将其内容简介如下：

《〈世说新语〉研究》 范子烨著。著者采用考论结合、由考立论的方式，对《世说新语》的体例、成书时间、编纂原因，敬胤《世说注》及刘孝标《世说注》，传世古抄本《世说新书》残卷，宋人对《世说新语》正文及刘《注》的删节，以及《世说新语》文本的疑难诸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著者对书中的故事原型、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亦多新的阐发。

《阴铿与近体诗》 赵以武著。著者一方面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深入考察了南朝诗人阴铿的家世、生平，重新解说了阴铿现存重要作品的背景与思想意义。另一方面，又按照中古字音，标

注阴诗四声，统计出阴诗与永明体、唐代定型的近体格律诗之间在声韵方面的对应状况，揭示了在中国古典诗歌由消极避忌声病转向积极遵守格律的进程中阴铿及其诗作的特殊地位。

《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 丁福林著。著者鉴于陈郡谢氏在东晋南朝人才辈出，长盛不衰，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形成一个庞大体系，力图对这个历时几百年的在中古文学史上最为雄强的家族文学集团，作一全面系统的论述。丁著展现了这个集团文学创作的历史长卷，反映出六朝文学的一个侧面。书末附陈郡谢氏世系表和年表，二表经著者翔实考证，列出一百多位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情况。

《六朝辞赋史》 王琳著。著者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专门探讨了六朝辞赋演变的历程及创作风貌。书中挖掘出一大批学术界未曾注意或少有涉及的赋家、赋作及赋论材料，覆盖面广；又经过考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予以匡正。该书从宏观上把握住建安至魏晋之际赋风的阶段性、南朝赋风的衰变及南北赋风的差异等现象；关注赋与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在比较中见异同，凸现其相互影响及各自发展的轨迹，同时对许多赋家的微观分析中，说明其传承创变之联系，揭示其个性特征。

第二批问世的四部专著与第一批出版的四部专著一样，也体现了同样的学术特色。兹简介于下：

《六朝诗歌语言研究》 王云路著。本书上编为概说篇，论述六朝诗歌的构词方式、语汇特色及其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等；下编为释词篇，是全书的重点部分，集中考索和解释了三百三十余条六朝诗歌语词，包括新词、新义以及习语、俗语等等，部分条目兼补《汉语大词典》之不足。著者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六朝诗歌语汇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尤多作者个人之发

明。作者采撷之第一手语言材料极为丰富，追本溯源，创获甚多。本书堪称为六朝文学研究与中古语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 罗国威著。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一大批六朝和隋唐间的《昭明文选》写卷，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对这批写卷的研究，既不系统又不深入。本书汇集了已经刊布的所有敦煌本《文选》的录文，并以传世的《文选》（一种唐抄本、五种宋刊本）与之勘核，订正了敦煌写本和今本《文选》的若干讹误。在此精细的工作基础上，作者进行宏观的研讨，使这批写卷在《文选》学和文献学上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和展示。在中国“选学”史上，本书无疑是一部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著作。

《世族与六朝文学》 程章灿著。世族是六朝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殊群体。本书将其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集中考察它对六朝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新解迭见，趣味盎然。作者擅长以史入文，考论融汇，在文史的结合点上实现突破。全书10章，分属上篇（总论）、中篇（分论一大家族论）、下篇（分论一作家作品论），附录三篇专论，既有统摄全篇的宏观研究，更有以点代面的个案解剖，视角新颖多变，论证深入细密，颇见功力。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

《六朝作家年谱辑要》 刘跃进、范子烨合编。本书汇集了由16位学者撰写的18种六朝作家年谱。即：《陶渊明年谱汇考》（袁行霈撰）、《陶渊明年谱简证》（王孟白撰）、《陶渊明年谱汇订》（杨勇撰）、《谢灵运年谱》（杨勇撰）、《临川王刘义庆年谱》（范子烨撰）、《鲍照年谱简编》（丁福林撰）、《沈约任昉年谱》（罗国威撰）、《谢朓事迹诗文系年》（曹融南撰）、《王融年谱》（陈庆元撰）、《四萧年谱》（胡德怀撰）、《江淹年谱》（俞绍初撰）、《刘勰年谱汇考》（牟世金撰）、《钟嵘年谱简编初稿》（张伯

伟撰)、《何逊行年考》(李伯齐撰)、《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罗国威撰)、《刘孝绰年谱初稿》(詹鸿撰)、《徐陵年谱简编》(跃进撰)和《庾信年谱》(鲁同群撰)。就书中所收年谱而言,无论是已经发表过的,还是本书首次发表的,都显示了严谨扎实、功力深厚的特色。此外,本书还有跃进编写的三种附录,即:《本书所收年谱出处及作者简历》、《六朝作家年谱参考文献》和《六朝作家生平研究论文要目》,这些资料对研究者也颇有参考价值;该书的确不失为本丛书之殿军。

本丛书的宗旨是:崇尚实证,弃绝浮言,提倡寓新颖观点于详密材料的治学风格。我们谨遵“百家争鸣”方针,每位著者各抒己见,自由发挥。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有关领导、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在商品经济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之今日,他们以远见卓识,在白山黑水之间,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不懈的努力。对此种高尚的精神情操,我们应致以深深的敬意!

限于水平,本丛书之纰漏在所难免,敬祈海内外同仁指正。

承前辈林庚先生亲笔题签及诸位学术顾问关怀指教,本丛书光彩大增,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于南京大学

归于平淡后的思考

跃进

—

现代意义上的中古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

所谓中古文学，约定俗成，一般是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不少研究者上挂下连，东汉以迄隋代，亦多有论列者。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段文学的际遇是颇为不同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以及陶渊明等作家备受推崇，评价甚高，而像永明文学、宫体诗等却时遭非议和指摘。有不少作家作品似乎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他们的存在；而有些作品如《文选》、《文心雕龙》等却是古今两大学术热点，成为显学。这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本应给予相应的阐释，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零乱，难以取得较大的进展。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相对处于沉寂荒漠的状态。唯其如此，本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首先即是从

史料的钩沉索隐开始起步的。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可以说是为这门学科奠定研究基础的第一部力著。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首先是它的资料的丰富性：每讲之下分别辑录排比当时的文学评论。鲁迅称：“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容易了，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人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另外，五讲之前有简论，辑录之后有案语，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只是这部书上不及东汉，下未论北朝，不无遗憾。后来刘永济著《十四朝文学要略》，上自先秦，下至隋朝，体例近于刘师培氏著述，即每题下先有简论，尔后徵引历代著作中的有关材料，并加案语，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遗憾有所弥补。刘师培之后，对中古文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鲁迅。他的研究注重于联系时代和社会生活，敏锐地捕捉最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过程和规律。譬如他用“药·酒·女·佛”四字概括魏晋南北朝文学现象，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药”与“酒”同文学的关系，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作出了精湛的阐释，而“女”与“佛”当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鲁迅虽未申论，却给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就是以鲁迅的研究为准则，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网罗中古文学史料，前后披寻，辑事比类，从研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人生活、学术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入手，从整体上勾划出从魏晋到南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本世纪八十年间，中古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没有超出上述学者厘定的范围。近十余年，中古文学研究又有新的拓展。曹道衡先生首先把目光转向整个中古文学研究尚未充分开发的北朝文学领域，在《试论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家考略》、《关于北

朝乐府民歌》、《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中，他将过去被视为“文学作品几乎绝迹”的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横比较，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王运熙、杨明先生合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以及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等，于有关材料，细大不捐，竭泽而渔，其资料之丰富，叙述之平实，在同类著作中推为翘楚，为中古文学研究展示了新的更广阔的研究前景。

就在中国文学研究以扎实的步伐向前迈进的同时，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他们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方法，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后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宏观研究大讨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要求。这场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大讨论，其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后来实践的检验，现在作出评说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确有其积极的意义。从那以后，学术界基本上摈弃了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对于过去似乎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认真细致的辨析工作。近些年来，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与数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探讨密不可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当时也确实有不少文章空空如也，或纵览古今，或贯穿中外；其实，这不是一时的弊病。几十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善于用这种大块文章装点门面，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所不同的，只是更换一些新名词而已。由此想到，对于方法论的讨论，其本身是否也存在一个方法问题呢？方法论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方法本身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套用

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方法论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方法是万万不能的，也是不可想像的。对于方法论的渴求，容易使人心浮气躁，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倘若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也就掌握了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于是许多年来，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寻找这把金钥匙。轰轰烈烈之后，有谁找到这样诱人的金钥匙了呢？

绚烂之极，终究要归于平淡。

站在世纪之交的关口，登高望远，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一下走过的历史，心平气和地对二十世纪中古文学的研究作一番冷静的思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近一个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从沉寂到活跃，从零乱到系统，学术进程的每一次大踏步跨越，视野的开阔、观念的更新固然起到了先导作用，而基础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它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研究者，他可以把逻辑的推绎奉为神明，也可以把对文学规律的探寻视为研究的终极目的，视为一个学者的真正使命。但是，他离不开这些最基础的工作。

从近百年中古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来看，所谓最基础的工作，我想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研究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二是对资料搜集工作的重视。这是我们全部研究工作的支点；离开了这个支点，一切问题便无从谈起。

二

对于研究者基本素质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文献学的训练就是其中之一。

十几年前，我追随姜亮夫先生学习古典文献学，他有一段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希望：“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为此，他给我们安排了许多在当时看来不甚理解的课程。记得我当时选修或旁听了许多课程，印象深刻的主要有《目录学与工具书》《校雠略说》（蒋礼鸿）、《广校雠学》（沈文倬）、《艺术概论》（陶秋英）、《秦汉货币赋役制度》（钱剑夫）、《古籍版本鉴定》（魏隐儒）、《中国古代官制史》（龚延明）、《中国历史地理》（陈桥驿）、《中国科技史》专题（《墨子》《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王锦光主讲）、《〈诗经〉研究》《中国古代历算》（刘操南）、《〈营造法式〉和中国建筑史》（沈康身）、《训诂学》《〈说文解字〉研究》（郭在贻）、《〈汉书艺文志〉研究》（雪克）、《〈广韵〉研究》（张金泉）等，这些课程，内容浩繁，一时确实难以消化，但是它却向我打开了一扇门窗，管窥蠡测，由此可以感受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我自己的体会，姜老不希望研究生很早就钻进一个狭窄的题目中，而是在二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开阔视野，培养寻找材料、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至于如何研究具体的课题，那就要靠自己的修行了。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不过守其一点而已，小有所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根本没有理由为此而沾沾自喜。晏殊有这样一句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先生称之为人生第一境界。其实真正能步入这种境界，也并非易事。而进入这种境界，就必须经过传统文献学的训练，这是我们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基本技能的训练。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传统文献学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历史上的“小学”。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代职官，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两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第三是先秦

几部经典，按照姜老的学术思想，《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周易》《老子》《论语》《礼记》《楚辞》等典籍是必须下大功夫精读的，含糊不得，因为这些全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底之学。第四才进入各个专门之学的研究，如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等。传统文献学涉及如此多的内容，而且都是很专门的学问，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研习传统文献学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寻找登堂入室的学术途径，学会怎样随时关注、密切跟踪相关学科进展的方法。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某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参考资料。章学诚早就说过，读书治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我想，传统文献学的作用就在这里。

当然，现代科技文明已经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作学问不能作茧自缚，作井底之蛙只能游离于世界学术潮流之外，必然为时代所抛弃。传统文献学仅仅是文献学训练的一个方面，尽管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还不是全部。若干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专门谈到补上国外文献学课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另一种文献学的训练。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本不成问题。而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学者来说，也许就是一个新的课题了。我们常说，学问没有国界。我们要走向世界，就要努力使自己的学问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起码应当使自己设法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平等的竞争。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国外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脱轨现象。近五十年来，我们对于国外同行的研究相当隔膜。客观条件的限制固然是主要因素，而主观的成见确实也阻碍了视野的开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以为拥有“国粹”，加之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得天独厚，国外的研究情况似乎无需过多关注。然而国门洞开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尽然。近来时常听到国外

同行批评我们不关心他们的研究，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漏洞。乍听起来颇感刺耳，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我们的研究，他们随时关注，而他们的成果，我们却难以借鉴。由于政治、经济的冲击，由于自我封闭，结果使我们失去许多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的机会，难免会有落伍之讥。近些年，只是很有限地接触了一些国外汉学研究的资料，觉得重提这个话题依然不过时。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专题目录来看，如《海外汉学资料调查录》《东洋文献类目》《亚洲研究文献索引》以及美国各大学所藏汉学论著，说它浩如烟海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确实不容忽视。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日本的《文选》研究（斯波六郎《文选索引》、小尾郊一《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兴膳宏、清水凯夫等对六朝文学研究（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考证》、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平田昌司《唐宋科举制度转变的方言背景》对于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等，均极有启发意义。此外，域外的研究资料，如韩国奎章阁藏书、日本私人及寺庙的藏书，晚清曾作过部分清理，依然有许多国内学者还远未能充分利用的新资料。

更重要的是，国外一些优秀的汉学家往往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又多具有语言上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时常能够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譬如，周边国家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已成为 20 世纪国际汉学界的“显学”之一。与中古文学研究有重要关系的一些重要命题，如“反切”、“四声”、“八病”等，为什么在魏晋以后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当时文学界讨论的热点，这显然与外来观念的刺激有重要关联。如何捕获这一重要脉络，限于资料，也限于知识结构，我们就不能不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又譬如，元明清时代的士人与韩国、越南、日本文人的交往及其相关文献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在这些方面作了